

以物鉴史

一座大楼与一个时代相遇

朱悦华

104年前，一座大楼与一个时代相遇。这座大楼就是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京大学第一院。它于1918年8月落成，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红楼。

高耸于青砖灰瓦中的北大红楼坚实庄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曾在这里风云际会。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一幕幕历史场景浮现眼前。

红楼展厅，全部63期《新青年》一字排开，组成一张20世纪初新思想新文化朝气蓬勃的时代面孔，仍是那么率真鲜活、情真意切。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敬告青年》开宗明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7年，《新青年》落户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结合，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桌上的一本打开的书，是所有人的视线中心。众人或坐或站，似在热烈讨论什么——红楼浮雕《八大编辑》饱满厚重。在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的小院，这些学贯中西的北大教授，抛掷出一枚枚射向封建专制重型炮弹。他们为妇女解放呼号呐喊，举起民主科学大旗，倡导白话文与新式标点，开辟中国现代文学新谱系……

眼前的报刊信札，承载了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大事件。以白话文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遏制新思想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段历史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浓墨重彩的表现。在剧中，蔡元培说：“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它终将是以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红楼2层，靠近楼梯是复原后的文科学长办公室。1918年，《每周评论》创刊，编辑部设在这里，发行所设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每周评论》与主导思想启蒙的《新青年》相得益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为五四运动提出不断深入的纲领、口号与斗争方式。

静卧17行的国家一级文物《五四》，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五四运动的书籍，作者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蔡晓舟和在北大国文系学习的表弟杨亮功（笔名杨量工）。蔡晓舟在序言中写道：“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1919年全国期刊如雨春笋猛增至400余种，红楼展出了《新潮》《语丝》《教育潮》《新学报》等当时影响较大期刊。五四运动把民主、科学的种子播撒进中国人的心田，随着时代改变仍具有感召力。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变革社会、塑造“新国民”的思想武器，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成果。《每周评论》从第26期起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期间，《新青年》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文章130余篇。展览现场展示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珍贵原件。

1921年11月，陈独秀手书的第一份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在明年七月以前”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陈独秀组织翻译的3本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李达主编的全套6本《共产党》月刊，半公开发行，16开本，最高发行量5000多份；陈望道、华岗、成仿吾、徐冰、谢唯真等人翻译的7种《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1年，李子洲、刘天章等陕西进步学生在北京创办的《共进》杂志11期；1924年，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负责印刷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8期……这些珍贵文物汇集红楼，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思想建党的基本样貌。



观众在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杜建摄(人民视觉)

核心阅读

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除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4000年前后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距今4300年至4000年，黄河中游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就是这一关键区域、关键时间点的代表性都邑遗址。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陶寺遗址自1978年启动正式考古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与进展，特别是2002年起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后，直至今日，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除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4000年前后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

考古发现的诸多夏商之前的大型遗址，为研究中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否具有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王墓)、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都是进行都邑遗址认定的标准。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构，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2019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

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分布于宫城外东南，约有上万座。已发掘清理的千余座墓葬表明，当时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大型高等级墓葬内，可见棺底铺满朱砂的木棺、丰富而精致的陪葬品；中型的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玉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型的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也没有任何随葬品。

陶寺的观象台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天文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通过观象台多次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发现那时的人们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4个重要节点，来掌握四季冷暖和农业耕作收获的节气，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通过天文官的观象活动，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智慧。

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华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

陶寺遗址展示的古代文明

何努



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实证了这个重要特征。

测时定位的圭表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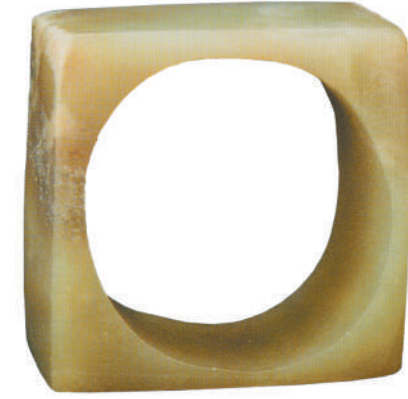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分别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圭表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水平置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直于地面



的柱是表，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经过10余年研究发现，在陶寺文化时期，圭表能够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

陶寺圭表系统还可以与步测结合，以陶寺古国都城为地中测量，确定陶寺当时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南西北四至点，被称为“四表”，并据此创立他们的“天下观”，即“东、西、南、北、中”的政治地理五方。陶寺都城的功能区划与微地貌环境相配合，在一套完整的观念指导下完成，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风雷相搏”，而东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东北、正西、正东八个重要方位已经用来代表不同的功能板块。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蟠龙纹陶盘，受到良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玉龙的启发，创造了中原的蟠龙形象，影响到后来的河南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两周、秦汉，直至发展到今天的中国龙造型。



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乐器，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鼓、鼙鼓、石磬形成组合，随葬在早期王墓中，显示八音初备。陶鼓、鼙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祝属八音之木。鼙鼓和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



图①至图⑤分别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壶、铜铃、玉琮、蟠龙纹陶盘、玉珪。

何努供图

版式设计：蔡华伟

汛期，文物安全值得重视

黄滋

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转变”。保护文物安全，需要全社会转变重抢救轻减灾的思想。通过灾前预防性措施和灾后科学修复，我们可以降低、减轻灾害对于文物的损害。

先行做好风险评估十分必要。我们可以建立并完善历年的受灾情况、维修记录、防灾减灾及安全措施等档案，适时开展文物的灾害风险识别与评估，明确风险类型、成因和影响，由此绘制出区域风险地图，甚至测算不危及文物安全的水位高度、河流最大瞬时流量等数据。细化防控标准，我们的工作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古老桥梁的汛期安全一直受到关注。洪水导致水位增高，造成巨大冲击力，产生的淤塞容易造成桥梁结构变形，甚至整体结构失效。雨涝也会引起建筑物结构变形，留下安

全隐患。河道日常挖沙、上游水库拦截和河道干涸导致桩基糟朽，都会让桥梁有可能在瞬间被冲垮。除了持之以恒地进行日常管理与检查，灾害季节还应当适当增加对桥梁的巡查频次，尤其要注意清理河道及河道周边的堆积物、漂浮物。

当前，越来越多科技手段被用于灾后修复。因为持续降雨，同时遭遇潮水高水位期，一些老城的城墙长时间浸泡在水里。退洪以后，墙体内部土体应力发生了变化，局部会出现突然坍塌的隐患。我们采用地质雷达的探测方式，结合相同位置历史照片比对、地质勘探数据等，建立城墙内部保存情况的数据解读方法。

欢喜永宁桥位于大运河杭州段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2017年由于持续降雨，桥体内部填充物含水量过于饱和，造成东北侧发生大面积的突然垮塌，修复时同样运用了新技术。考虑到垮塌部位不稳定，我们突破传统脚手架搭

设勘查的方式，采用无人机进行倾斜摄影测量，精准高效获取整体垮塌情况记录，再利用工程船对局部细节进行补勘，完善垮塌部位的测绘勘查，加快了抢险加固工程进度。

很多古建筑存在了几百年甚至更久，历经多次自然灾害而能幸存，体现了古人在选址、选材、建筑原理、因地制宜进行灾害防御方面的智慧。古人的智慧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预防性保护提供思路，除了及时运用新技术手段，我们也需要向古人学习。

我国是文物大国，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形态种类多，是中华灿烂文明在广阔大地上的重要载体。我国又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类型多样、影响范围大、破坏性强，如何全面提升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让不可移动文物延年益寿、传之久远，需要我们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为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如何全面提升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让不可移动文物延年益寿、传之久远，需要我们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贡献智慧与力量

随着多个省份陆续进入防汛关键期，文物安全再次牵动大众的心。

夏季气温升高、极端天气增多、降水量加大等等，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短时间强降雨天气增加，高水位引发洪水，城市内涝积水增多，以及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都会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更不用说风暴雨甚至海啸的风险。

多年来，各级文物部门为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